

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宏观问题

SEVERAL MACRO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杨叔进

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有几个宏观问题是带关键性的。第一个是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收入分配的均等问题；第二个是投资（investment）和储蓄（saving）的问题；第三是对外贸易问题。这三个问题看来好象是互不相干的，实际上有很密切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多半是注意如何迅速地增加国民收入，很少注意到收入的分配问题，从而出现了“增长率的竞赛”，看谁能够尽快地提高增长率。有些国家做得很成功，有些国家还是相当的缓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有：以色列、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它们之中有的增长率达到每年10%左右。他们的手段是增加投资和增加出口，随之进口和储蓄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以此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可是有些国家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却发生了很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之所以会发生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大多数的国家最初发展的时候，总是发展工业品生产以代替进口的工业品，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总收入。这种手段多半是靠采取保护政策，即对进口实行限制（不但提高关税，而且限制数量）。这些工业多半是私营的，由于它们受到贸易上的保护，其产品在国内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可以赚很多的钱，这一部分利润就落到资本家的手里了。所以在有些国家里，使极少数人发了大财，比如在巴基斯坦、巴西就是这样。其结果严重的会招致政

治危机。所以在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收入分配的问题。

从统计中发现，在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的最初发展阶段，国民收入的分配开始时也逐渐发展为不平均，只是达到一定的阶段，剩余的劳力全部就业，实际工资率开始上升，国民收入的分配才开始改善。这个长期的发展趋势可用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从统计中发现）来表示。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也会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即到一定阶段，国民收入的分配自然会改进，所以用不着担心。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的效益会慢慢地渗透下来，最终到达收入最低的人们手里。他们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最终每一个人都应能得到好处。

实际上，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初发展时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也不相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能等待那样长的时间，尚是问题。况且它们的人口压力比已发达国家当初发展的时候大得多，达到完全就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假设这些国家不能等待那样久（事实证明有的国家在较长期的等待中，已在政治上、社会上发生了危机），就不能够听其自然发展，而要由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改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然的话，只注意经济增长，社会是会出毛病的。因此，另一些学者主张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对增加的这部分国民收入要实行再分配。

第三部分人认为，单靠这种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国民收入增加部分的再分配为数有限，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其中一部分到达低收入的人民手中。经验证明，甚至即使这些也很少能到他们的手上，尤其是在农村。比如印度，绿色革命（改良种子、肥料）

杨叔进（Shu-Chin Yang）发展经济学家，任职世界银行政策计划和项目审查部，曾访问和研究过33个发展中国家。

* 本文系作者为原计划1981年出版的《科技导报》第五期撰写的文章。

使农业生产所增加的收益绝大部分落到地主和富农的手中，因为他们有很多方便可得到改良的种子、肥料，得到农业信用贷款（credit loan），而没有土地的贫穷农民则得不到这些好处。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要设法给贫穷农民直接提供政府援助，给他们提供生产资料以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据一个模式推测，采取这种办法，如每年从政府的收入中拿出相当国民生产总值（GNP）2%的投资到这个方面援助穷人，经过四十年，每年也不过使他们增加0.5%的收入。这部分学者主张要直接关注人民的基本需要：营养、自来水、基本的卫生条件、教育等等。如果这些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就不必考虑如何改进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问题。这是现在正在辩论中的一个很热烈的问题。

投资与储蓄

假使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话，那么，什么是提高增长率最有效的方法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因素很多。不过多数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资本（以及同它密切相关的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剩余劳动力，可是劳动力使用的工具却不足。因此，要增加生产，一定要增加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资本有多种不同的类型：火车、公路、工具等等。当然资本并不是增加国民收入的唯一因素，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比如说，技术、教育、组织、制度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重点仍是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来自投资。今天的中国劳动力是不缺乏的，可是需要资本和技术，而资本和技术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很多技术体现在资本上，比如以选用某种机器的方式增加资本，就意味着选择哪种工艺技术。

投资

1. 投资水平与投资能力

以前，刘易斯（Auhur Lewis）和罗斯托（W. W. Rostow）认为，投资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从8%增加到10~12%，就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过了关，可以开始“起飞”了。现在就是达到12%恐怕也不够，要到15~16%，才能谈到“起飞”。今天中国的投资率大概达到30%以上。如果统计是正确的话，投资水平的问题就不大了。不过要再增加新投资，有些问题就来了，因为增加新投资并不是把钱拿来花了就算完了。光买机器没有用，要生产就要有厂房，要有人来管理，要有运输网，要有原料和配件，产品要运出去，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投资大的工程（如水力发电、灌溉），不但需要买机器，而且需要很精密的设计和建设，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是否有足够的技术人员、工程师、财务分析人员、经济学家来分析一个工程计划是否可行？是否已经建立起一套标准

来进行选择和判断。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叫做投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进行新的投资以前，需要首先解决投资能力问题。

2. 投资的组成和比例

对这个问题，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家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大推进”论，主张把投资用于基础设施（象交通、电力、大水坝、大灌溉工程、电讯等）。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投资在这方面可以带动其它生产的发展，比如有了电力和交通，其它工业就可以发展了。另一些人主张“不平衡发展策略”，认为不应该先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因为把钱花在这上面，不一定能吸引足够的工业来利用，可能浪费投资（如修了很多公路，但没有足够的车辆）。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先尽量发展直接生产的部门，这些部门发展了，自然会增加对电力和交通的需要。这样，有了需要，再去发展电力和交通就有市场，就不会浪费资源了。

另一种是平衡增长论（balanced growth）。即各部门的发展一定要平衡，不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所有部门的发展都要平衡。怎么样才算平衡呢？这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从需求弹性找到。例如国民收入增加了，可是对食物的需求不会象对衣服或住房的需求那样增加得那样快，因为一个人吃得有限。假使我们能查明，随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对各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弹性如何，然后再找出各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比率，就可以根据这些算出每一部门应投资多少，这样增长就可以平衡了。所谓比例关系的决定，也就有了客观依据。这个说法还必须考虑到对外贸易，因为对外贸易可以调节供需关系，不必一切消费和需求都靠国内生产来满足，国内生产不足或不宜于生产的产品可由进口弥补，而出口比较有利的产品。更精确的算法是把各个产业部门间的关系也计算在内。所有这些计算都需要正确的资料，如果资料不正确、不可靠，算出来的结果与实际差得很远，实施起来，偏差就很大。此外，在执行投资计划时，肯定会有别的因素发生，需要随时调整，而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机械算出来的结果僵硬地实施。

今天，在中国，农轻重的比例当然很重要，但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这两者的关系应该更注意。“不平衡增长理论”虽然有其言过其实之处，因为实际上一个国家如果等到电力已经缺乏时再开始投资电力，就已经太晚了。因为投资于电力至少要两三年，大的水力发电站可能要五到七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建成。在建成之前，电力供应不足，就降低了生产能力。对电力的需要是逐渐上升的，可是电力的供给是直线上升的，建好一个大电厂，供电量就会立即大幅度地增加。在这种供需关系之下，一定要预测对电力的需要，预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对电力的需要大概要增加到什么程度；然后计划电厂建筑，每隔几年有几个电厂建成才能够适应需要。不然的话，因为缺电而使工厂停工，就不能充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对电力消费的

预测，可根据电力消费的构成来看，找出居民户、工业、运输等方面对电力需要的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关系，再估计将来对电力需要的弹性。除了电力之外，交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直接生产产品所需的基础设施。此外，电话、电报、电传等服务也是能增加生产效率的一项基础设施。

3. 投资的内容

今后，在中国的投资方向可能有所改变，进口的成份在投资中恐怕要增加。过去，中国所达到的高投资率，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把劳动力转变为资本形成。比如用大量的劳动力来修路或兴修田间的灌溉工程和水渠，这些都是把劳动力转化为资本，并没有用很多别的工业材料。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中国劳动力有剩余。香港也是这样。香港土地稀贵，用剩余劳动力来填海建筑飞机场，这也是很经济的办法。中国过去所以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因为有着相当大一部分剩余的劳动力用于简单的建筑，如挖土、挪土、引水进来，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资本。所用的资源是国内的。将来的发展，比如在农业方面，中国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灌溉已经不是在田间修水渠的问题，而是要建造大水库。要修筑大水坝，所需要的就不完全是劳动力了，而是需要技术，需要机器。这种技术和资本可能需要从国外引进来，因此进口的成份就增大了。比如说制造业方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使用铝和塑胶，可是在中国，铝和塑胶仍是很稀少的物资。要投资于这些中间产品的生产，恐怕进口的成份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将来投资的方向可能将需要更多的外汇。

储 蓄

过去，投资多半是依靠本国的储蓄。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资本，是不通过货币机制起作用的，而是直接转化，这也是真实储蓄，但是这种储蓄形式将来可能使用的范围有多大，就很难讲了。假如要使必须经过货币储蓄而形成的资本比过去更多，那就要看政府对增加储蓄所采取的政策了。

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简单关系，可用哈罗德—多马（Harold-Domer）模型来说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率，就是增长率。假使投资只来自国内储蓄，则这个模型就是封闭式经济，没有对外贸易，或者对外贸易永远是平衡的。这个模型与中国的自力更生模型很相近。自力更生模型是说，假如资本—产出比率是既定的，那么增长率就只受国内储蓄率的限制，因为没有别的来源。假使积极利用外资，投资率就会比只靠自己储蓄为高，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注意争取外援，象印度、巴基斯坦等等。它们编制计划（五年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靠这个能够争取外援。

发展经济学家（包括外援授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多是同意并支持这种看法的。

因此六十年代是外援的“黄金时代”，数目很大，大家都希望通过外援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因为利用外援提高了增长率，因而国内的储蓄率也跟着提高了。这样逐渐形成它自己的经济运行的一部分，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而不再需要更多的外援。可是有的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象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还需要大量的外援。

关于国内储蓄，我们都知道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理论，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所占的比例就减少，储蓄所占的比例则增加。这就是说，一个家庭的收入提高了，这个家庭的储蓄就跟着增加。由此推论，那么在一个国家里，收入分配愈不平均，储蓄率就愈高，可以用来投资，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而改善分配则会减少国内储蓄，降低增长率。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家庭的储蓄不是完全取决于现期的收入，而是决定于这个家庭认为可以维持相当长久的收入水平。有的人认为，一个家庭的储蓄，不是看他的绝对收入水平有多高，而要看他与别人相比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型式。即当你看到你的邻居比你的收入还要高，他有两辆汽车，你也想要有两辆汽车，所以过两年假定你的收入增加了，你并没有把这些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而是拿来买另一辆汽车了。这就叫做“示范效应”，意思是别人向你显示了他的生活格局，你的消费也就跟着上去了。所以这些年来美国的国民收入虽然增加很多，但储蓄率并没有提高。

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国际上来分析储蓄的形成，可发现日本和苏联是未受“示范效应”而实现高储蓄率的两个例子。它们把国外消费的影响给隔绝了。苏联是用计划经济来控制消费，日本人则习惯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明治维新以后那一段时间，很少受西方消费方式的影响。

再来看今天中国的情况，收入分配很平均，似乎对于形成大量储蓄不利，可是国际消费的“示范效应”对中国没有什么作用。中国现在开始对外开放了，可是程度有限，总的来讲不会使生活方式有太大的改变。中国的储蓄仍是自力更生型的，要靠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其次，中国对于消费，在商品供应方面有一个计划机制来调节。有了人民币，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因为消费品的供给不足，还要靠使用票证来分配，用以保障收入增长时消费的平均分配。如果在供给方面也能有计划的增产，那么迟早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可以逐渐提高（如自行车，现在总的供应情况已有改善，但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还不普遍）。这样，在达到高储蓄率的同时，也可保证公平地分配消费品。

外 贸 与 外 资

在开放经济情况下，投资不一定完全要依靠国内

储蓄, 不足之数可用外资弥补。这在对外贸易上所表现的就是入超, 即投资-储蓄=进口-出口。从国内看, 投资和储蓄之间有一个缺口, 这是储蓄缺口。从对外贸易看, 出口比进口少, 这是贸易缺口。在均衡情况下, 这两个缺口相等, 都靠外资的流入来填补, 也就是利用外资购买入超的物质用来进行投资。在达到均衡状态之前, 这几个宏观方面的变数在动态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中国在目前的形势下, 贸易的缺口可能比储蓄的缺口更重要, 限制性更大: 即中国的储蓄相当高, 而赚取外汇的能力并不十分强。换句话说, 外汇的限制比储蓄的限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在中国目前的生产结构情况下, 有很多产品不一定是国外市场所需要的。如能适应国外市场, 发展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和接受更多的外资, 就可以进口更多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 以加强国内生产上的薄弱环节。

进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方面的发展情况一般是从“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开始。初期的制造品“进口替代”不是很难的, 很多国家用保护政策来促进它的实现, 即从前进口的制造品现在可以在国内制造了, 因此进口的数量跟着减少了。这对于平衡国际收支很有帮助。可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 情况就会变化。这是因为: (1) 在保护政策下, 由于国内生产成本高, 而“进口替代”的范围又越来越小。因此能节省的外汇就越来越少。(2) 制造初级的、比较简单的制造品需要中间产品, 象做塑料的袋子, 就要进口塑料, 生产增加, 需进口的原料和中间产品也就随之增加了。(3) 有的国家因为国内生产效率不够高, 照世界价格算, 成本可能比进口的原料(到后来可能比出口的产品价格)还要高, 结果反而起负的作用。(4) 靠这种发展策略达到工业化目的的国家对于农业方面一般比较忽略。因此它们不鼓励出口传统初级产品。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 这类国家的国际收支虽然在初期有所改善, 但过十几年以后, 国际收支又会开始恶化。

增加出口

到六十年代中期, 有些国家就改变了它们的策略。开始由进口替代转而注意出口。因为生产初级制造品已经有了基础, 经过政策上的相应调整(尤其是外汇政策, 或者是出口补贴), 就可以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 更重要的是向已发达的国家输出。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很快。制造品出口增加很快的好处是: 第一, 能得到较多的外汇; 第二, 在和外国商品竞争中可以促进国内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 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因为出口产品的需求不是根据国内而是根据世界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对一个出口国家而言可以说

是无限的。同时, 由于出口增加很快, 对外债的偿还能力也加强了, 借外债也比较容易。所以, 有几个国家和地区(上述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这一类型), 是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

笔者认为, 中国也到了注重出口这个阶段。中国在“进口替代”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了, 不过成本和效率方面还需要改进。假使中国开始向外输出产品, 为了竞争, 自然要提高效率 and 降低成本。现在没有资料可以判断中国生产的成本和效率是多高。如果跟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比较, 还有一个用什么汇率去折算的问题。这都是值得研究的。不过很明显, 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开始奖励出口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不同的是在五、六十年代, 发达国家是相当开放的。现在因为石油价格高涨所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 发达国家已开始注意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输出, 贸易政策已开始转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在外交方面积极争取发达国家减除保护和给予贸易优惠外, 更需要特别努力争取国外市场。也许中国可以利用沿海的工业区(出口运输费用比较少), 建立一个沿海出口工业区, 来发展出口。

出口的增长率和利用外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向外借款而言, 假定偿还外债的负担是出口值的15%, 一般来讲是相当稳妥的; 但是如果出口值的增长很慢, 15%也会嫌高。假使出口增长很快, 未来的外债偿还便有来源, 就可以借到更多的外债, 用来引进技术和增加生产能力。

转变时机和困难

“进口替代”和发展出口不是相对立的策略, 而是自然的前后程序。没有“进口替代”这个阶段, 就不能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 可是有了基础以后, 保护得太久了, 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这就要改变策略, 转到促进出口方面。这个转化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判断国民经济到了转折的时机、应该采取促进出口的政策了呢? 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策略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进口替代”阶段已经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一部分做“进口替代”生意的工商业者, 他们得了很多的好处, 因为当时外汇是受管制的, 什么人能拿到进口的外汇, 产品卖出去马上就可以赚钱了。这部分人由于受到保护, 就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会反对调整外贸政策。可是从事出口的工商业者却要求调整, 因为汇率对他们不利, 没有办法积极发展出口。因此,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时期多半是: (1) 货币贬值或采取复汇率。一些南美国家因为有持久的通货膨胀, 采取了汇率“指数化”办法, 即相对通货膨胀的程度不断地调整汇率, 以维持出口的竞争性。(2) 免除出口产品用的原料的进口税。(3) 发放出口信贷, 或给予出口补贴(10%~15%)。

到了初期的促进出口阶段, 这一过程并没有完结。

因为发展的出口产品还只是简单的制造品(如纺织品、小型电器)。再走下去,又要被另一个阶段所代替,即制造比较高级的产品(比如钢铁、石油化工产品、肥料、机器产品等)。这时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已经有相当大的改进,国内储蓄率也提高了,因此有能力再投资于更高级的工业品,来替代这类产品的进口。在这更进一步的替代阶段取得相当成功以后,就应该再开始搞这些新产品的出口了。

总 结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虽然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把着重点放在收入分配和满足贫民基本需要方面,但中国已基本解决了分配和吃饭问题,社

会基础稳定,因此可以放心大胆地搞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据外国专家估计,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每年大概是5~6%左右。现在形势好转,安定团结,大家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增长率应可提高到6~7%左右。这样在十年内,国民总收入即可加倍。如能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可增长4.8~5.8%。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问题:第一,加强教育、提倡科研和改善企业管理以开辟内部的资源;第二,通过发展出口产业(特别是劳力密集型出口业)和适当利用外资以弥补“储蓄缺口”和“贸易缺口”;第三,除了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以外,更要注意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之间的投资比例。

·上接14页·

另一个货架上,摆有高度的车间组织纪律性,就象在联邦德国或瑞士工厂里一样。在第三个货架上摆着没有衰退的经济增长;第四个,摆有物价稳定;第五个,摆有在外贸上迅速调整生产以适应需求。体制设计者用他的手推取货车沿途收集这些“最佳零件”组成他的“最佳体制”。

但是这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历史并没有提供这种超级市场,我们在其中可以自己选择我们所喜欢的东西。随便哪个现实的经济体制都由一个有机整体组成。它们可能同时包括好的和坏的方面,并且比例或多或少是固定的。体制的选择祇在于各种“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之间。不可能从不同的“成套包装”(Package)里挑出我们所喜欢的零件而不要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零件。

依我看,似乎不可能创造一个封闭的和谐的社会经济规范理论,它既会毫无矛盾地坚持一个具有政治——伦理价值、又同时提供经济效率的体制。如果这个理论为追求其现实性而想要顾及人民、团体、组织和社会群的真实行为特征,简直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去考察现存的诸社会,并为它们的行为规律性找出解释。我们的科学必须找到如下问题的答案:即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如何在不同的规范原则之间作出妥协,这可能是一个会带来若干社会益处的科学活动。千真万确的是,它不能导致设计一个完备的社会,但它可以对于改良那些现存的社会有所贡献。

参 考 文 献

- Arrow, K.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Csikos-Nagy, B. 1978. Ten year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Hungarian Quarterly*, pp. 31-37
Deak, A. 1978. Enterpris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cta Oeconomica*, vol. 20, pp. 63-82

Friss, I. (ed.) 1971.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Gado, O. (ed.) 1972.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Gado, O. 1976.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How it Works in 1976*, Budapest—Leyden, Akademiai Kiado—Sijthoff

Kornai, J.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1979. Demand-constrained versus resource-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Kornai, J. Forthcoming. *Economics of Shortage*

Lange, O. 1964.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Lippincott, B. E. (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first publication in 1938)

Marx, K. 1962.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in Marx, K. and Engels, F., *Werke*, vol. 19, Berlin, Dietz (first publication in 1890-1891)

Nyers, R. 1970. *Twenty Questions and Answers*, Budapest, Pannonia

Peter, GY.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jövedelmezőség jelentősége a tervgazdálkodásban* (The significance of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planned econom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名 言 录 ·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的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华罗庚

* 在本文中所提的诸问题显示出与艾罗(Arrow)的著名的“不可能性理论(impossibility theory)”的某种相似性,见Arrow(1951)。